

对话

东西方哲学

吾敬东 刘云卿 郭美华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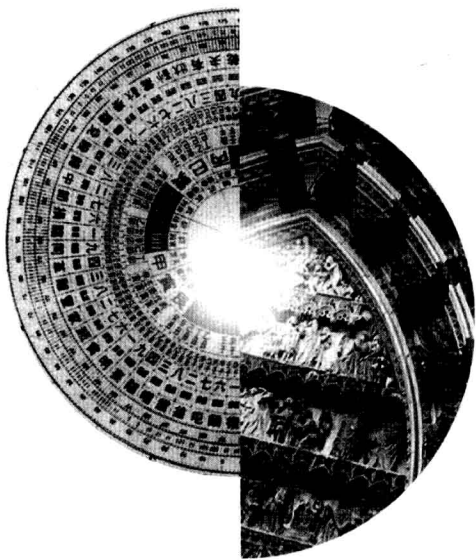


上海三联书店

对话

东西方哲学

吾敬东 刘云卿 郭美华 主编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对话:东西方哲学/吾敬东,刘云卿,郭美华主编.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2.9

ISBN 978-7-5426-3902-8

I. ①对… II. ①吾…②刘…③郭… III. ①东方哲学—文集②西方哲学—文集 IV. ①B-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52679 号

对话:东西方哲学

主 编 / 吾敬东 刘云卿 郭美华

责任编辑 / 黄 韬

装帧设计 / 鲁继德

监 制 / 任中伟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网 址 / www.sjpc1932.com

邮购电话 / 24175971

印 刷 /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2 年 9 月第 2 版

印 次 /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40×960 1/16

字 数 / 200 千字

印 张 / 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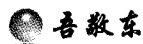
书 号 / ISBN 978-7-5426-3902-8/C·437

定 价 / 33.00 元

目 录

论人类早期思维的普遍特征 / 吾敬东	1
中西哲学真理观比较:孰是孰非? / 谢文郁	18
如何以知行事? ——对明知故犯现象的哲学解释/ 方旭东	33
人禽之别的担当 ——对孟子抱负的生存论理解/ 郭美华	40
中西哲学的差异与原因 / 张祥龙	55
“中学西渐”与马克思主义 / 张允熠	70
中国哲学研究三十年回顾 / 陈来	92
俞伯牙与钟子期:“朋-友”现象释义 / 张志平	103
邯郸学步,失其故步 ——也谈中国哲学研究中的反向格义问题 / 张汝伦	117
谈谈中国哲学的话语特征问题 / 马德邻	161
中西之学与世界哲学 / 杨国荣	174
康德黑格尔论伪善 / 邓晓芒	185
现代主体性的起源、危机及其归宿:去存在 还是为他者/ 孙向晨	213
道德感动与儒家伦理 / 王庆节	237
从图像到诗意图像:哲学与非哲学中的回忆问题 / 刘云卿	249

论人类早期思维的普遍特征



人类思维在原始或早期阶段形成若干最基本的特征,这些特征具有普遍的性质,其包括:以主体需要作为起点而形成的功利特征、因现象或事物多样性而形成的具体特征、因现象之间相似性而形成的比类特征、因事物之间相关性而形成的整体特征、因主客之间相通性而形成的互渗特征以及因实践和观察反复积累而形成的经验特征。也许,作为原始或者早期思维并不仅限于这些特征,但这些特征的确是非常普遍而且十分重要的。若不发生明显的断裂,或者不发生突破性的进展,这些特征就会自然地延续下来,并对后人的思维与思想产生深刻影响。

一、以主体需要作为起点而形成的功利特征

按照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原理,原始或儿童思维的起点,应当是从主体自身的需要出发的,换言之,也就是从生活或生存的现实出发的。皮亚杰说:“可以说,一切动作,即一切行动、一切思维或一切情绪,都是对一种需要的反应。如果不是由于一种动机的活动,任何儿童或成人都不会在外表上做出任何动作,甚至不会完全在内心产生什么活动;这种动机总能转变成为一种需要(一种基本的需要,一种兴趣,一个问题等等)。”^①所以可以说,需要也即生活或生存的现实性应当是原始思维与观念的一个基本出发点。而这样一种需要起点或者原则,在人类整体或者个体的生存中即体现为功利特征。可以这样说,无论是自然崇拜,还是巫术信仰,抑或知识问题,原始人的思维与观念中都有着十分明显的功利特征。

① [瑞士]皮亚杰:《儿童的心理发展》,山东教育出版社,1982年,第24页。

一般说来，自然崇拜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得丰富的生活资料，而巫术信仰的功利特征更加明显，其特点就是通过人为控制来达到趋利避害的功利目的。一言以蔽之，原始宗教的目的是为人而非为神，为现世而非为来世，为此岸而非为彼岸。所以原始宗教具有极大的现实功利性。休谟就曾经论述过这一问题，他说：“我们可以总结说，在所有曾经信奉多神教的民族中，最早的宗教观念并不是源于对自然之工的沉思，而是源于一种对生活事件的关切……”^①涂尔干也指出：“巫术的存在，仅仅是出于暂时的功利目的。……巫术禁忌只是行之有效的箴言，是保健和医疗禁忌的最初形式。”^②并且，“毫无疑问，正因为巫术所追求的是法术和功利等方面的目的，所以它并不把时间浪费在纯粹的思辨方面。”^③

不过，对此问题研究得最为深入的仍是文化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马林诺夫斯基是从文化功能主义的立场出发，对原始宗教特别是巫术及其思维与观念的实用与功利特征给予深入研究的。其主要内容如下：

首先，马林诺夫斯基指出巫术的存在乃在于其所具有的实用或功利意义。马林诺夫斯基说：“巫术纯粹是一套实用的行为，是达到某种目的所取的手段。”“因为巫术是深深地夹杂在知识与实用技术里面。”“巫术属于人类，不但是因为巫术为人类所有，而且因为巫术的题材主要是人事的题材，如渔猎、园艺、贸易、调情、疾病、死亡之类。巫术用于自然界，不如用于人与自然界的关系或足以影响自然界的人事活动上为多。”^④很显然，马林诺夫斯基认为巫术是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为此，马林诺夫斯基还对巫术与宗教做了区分，他说：“巫术是实用的技术，所有的动作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宗教则是包括一套行为本身便是目的的行为，此外别无目的。”^⑤“宗教创造一套价值，直接地达到目的。巫术是一套动作，具有实用的价值，是达到目的的工具。”^⑥

① [英]休谟：《自然宗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3页。

② [法]爱弥尔·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97页。

③ 同上，第49页。

④ [英]马林诺夫斯基：《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53、61页。

⑤ 同上，第75页。

⑥ [英]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51页。

但马林诺夫斯基也指出,原始人并非在所有的时候都使用巫术。那么,原始人究竟在什么时候或什么情况下使用或求助巫术呢?马林诺夫斯基以为大致包括如下场合,第一,“人们只有在知识不能完全控制处境及社会的时候才有巫术。”第二,“只有那些靠不住的,大部分见不到的效果,那些一般归于命运,归于机遇,归于侥幸的事,初民才想用巫术来控制的。”特别是第三,“在任何危险的”时候,“就免不了巫术”。“那有危险及拿不稳的”时候,“巫术便立刻出现了。”^①总之,马林诺夫斯基认为:“凡是有偶然性的地方,凡是希望与恐惧之间的情感作用范围很广的地方,我们就见得到巫术。凡是事业一定、可靠,且为理智的方法与技术的过程所支配的地方,我们就见不到巫术。更可说,危险性大的地方就有巫术,绝对安全没有任何征兆的余地的就没有巫术。”^②

那么,“为什么大家这样相信巫术呢?”马林诺夫斯基进一步分析了原始思维对于巫术的心理诉求。马林诺夫斯基说:这是“因为巫术的经验上真实性可以由它的心理上效力来担保,因为它的形式,构造和意态都与人类身体上的自然历程相呼应。在这些方面所涵蓄的信念,很明显地会伸展到标准化的巫术本身。也许这就是巫术信仰的最深固的根蒂。”^③“巫术就这样供给原始人……一件具体而实用的心理工具,使人渡过一切重要业务或迫急关头所有的危险缺口。巫术使人能够进行重要的事功而有自信力,使人保持平衡的态度与精神的统一……提高希望战胜恐惧的信仰。巫术表现给人的更大价值,是自信力胜过犹豫的价值,有恒胜过动摇的价值,乐观胜过悲观的价值。”^④可见,巫术在原始社会的盛行或弥漫又有着其内在而深刻的心理原因。

与现象及其具体性特征对早期思维产生深刻的影响一样,可以看出,主体的需要或生活的现实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功利性特征同样在原始思维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对于绝大多数民族或文化而言,观念发展很难想象会剥夺现实生活或主体需要在其中的位置与权利,因

① [英]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53、55、56页。

② [英]马林诺夫斯基:《巫术宗教科学与神话》,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122页。

③ [英]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69页。

④ [英]马林诺夫斯基:《巫术宗教科学与神话》,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77页。

此，如果这样的内容在未来的思想中重现是不应当感到奇怪并遭受非议的。

二、因现象或事物多样性而形成的具体特征

那么，人类早期思维自身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状况呢？近现代的人类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为我们还原了思维与精神发生的最初历史图景，它使得我们了解到人类思维在最初阶段发展的一些基本面貌。

如列维-布留尔从人类学的角度对此作了考察。列维-布留尔在他在《原始思维》一书中曾引用了一个叫安东尼奥的土著人的材料：“安东尼奥不但准确地记住一切河湾，而且每次当我问到他时，他都能正确地告诉我到某个地点以前还有多少河湾。他脑子里有这河流的一幅地图；或者更正确地说，他是在自己的记忆中按顺序保持住了若干表面看来不重要的事实，例如，这里是树，那里放了一枪，更远点地方有些蜜蜂，等等。”^①显然，这个叫安东尼奥的土著人是通过具体形象的细密观察与记忆来把握事物的。列维-布留尔指出：“这种记忆，这种具体的、能够把感性印象的最微小细节按其出现的顺序正确地再现出来的记忆，它的这种惊人的发展，也在另一方面表现出来，即在原始人语言的词汇丰富和语法的复杂方面表现出来。”^②值得指出的是，列维-布留尔所说的原始人语言的词汇丰富性和语法复杂性其实就是其思维形象性与具体性的表现。

那么，形象与具体的语言、思维又如何转化为抽象和一般的语言、思维呢？一般来说，人们的通识是原始人缺乏概括与抽象的能力。如拉法格指出：“在野蛮人的语言中没有表示一般概念的词，如‘人’、‘物体’等等。”例如“在塔斯马尼的土人中有丰富的词来表示不同种的每一棵树，但是就没有表示一般‘树’的词。”^③但列维-斯特

① [法]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108页。

② 同上，第109页。相关内容可参见此书第四章：《从原始人的思维与他们的语言的关系看原始人的思维》。

③ [法]拉法格：《思想起源论》，三联书店，1963年，第60页。

劳斯的研究进一步深化了我们的认识。列维-斯特劳斯在《野性的思维》第一章开头就指出：“长久以来人们已经习惯于运用不包括表达‘树’或‘动物’这类概念的字词的语言，即使这类语言含有各物种和变种的详细品目所必需的一切词语。但是，虽然这类情况被引用为‘原始人’的所谓不善抽象思维的证据，同时却首先忽略了另一类情况，这类情况表明，丰富的抽象性词语并非为文明语言所专有。”^①列维-斯特劳斯又指出：“再者，即使本章开头时提到的有关所谓原始人语言的看法可以原封不动地接受。我们也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这类语言缺少一般性的观念。像‘橡树’、‘山毛榉’、‘桦树’等词与‘树’这个词一样，也同样有资格被看作是抽象词。而且按照这一观点，一种包含有‘树’一词的语言，在概念的丰富性上也不如那种虽然缺少这个词但却含有数十数百个个别物种与变种的词的语言。”^②我们可以看到列维-斯特劳斯不是站在所谓文明人的高度来割裂地看所谓语言的抽象或概括问题，而是站在思维与语言的发展和进程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并且，列维-斯特劳斯指出，分类活动在思维由具体到抽象、感性到理性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如列维-斯特劳斯说：“任何一种分类都比混乱优越，甚至在感官属性水平上的分类也是通向理性秩序的第一步。”^③

另国内也有学者对早期思维的形象具体特征以及从具体到抽象的最初进程作过探讨。如张浩将早期原始思维从形象到抽象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直观的动作思维、具体的形象思维、类化的抽象思维。^④又如刘文英认为：早在猿人那里，就已经有了“最低级的概括性和抽象性”。^⑤而到了新石器时期，原始人的思维已经步入“意象-概念”的阶段。具体来说，“意象-概念”阶段又经历了意象符号水平（如广泛见之于中国新石器时期陶器上的图画符号；其进一步的形

① [法]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3页。

② 同上，第5页。

③ 同上，第21页。

④ 张浩：《思维发生学——从动物思维到人的思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94页。

⑤ 刘文英：《漫长的历史源头——原始思维与原始文化新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01页。

式是刻划符号，也广泛见之于中国新石器时期的石器、陶器、骨器上)、简单概念水平等不同阶段(即大量的具体概念)。^①

我们可以看到，从维柯、拉法格到列维-布留尔和列维-斯特劳斯都强调了语言或概念在最初阶段的形象与具体特征。我们也看到列维-斯特劳斯是如何通过语言认识与论述思维从形象具体到抽象一般的发展进程。这其中也包括国内学者一些十分有意义的研究。

皮亚杰则从儿童心理学与发生认识论的角度论证了作为早期思维或认识的形象与具体性质。按照皮亚杰的理论，认识的形成或认识心理的发生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阶段：感知运动阶段、前运演阶段、具体运演阶段、形式运演阶段。其中，从感知运动阶段到具体运演阶段大致是与人类的原始思维阶段相当的。在这几个阶段，思维位于形象和具体的水平上。皮亚杰在《儿童心理学》一书中说，儿童的认识“直接与具体事物相联系，而与命题运算中采用语词进行假设的方式不同。”^②在《发生认识论原理》一书中也说，“在儿童的原始宇宙里是没有永久客体的。”^③儿童还“死死地停留在与活动相当的概念水平上，而不能不受拘束地表达自己的思想”。^④译者对这段话有一个注：“这是说儿童的概念此时还停留在不能离开活动的具体概念水平上，还没有出现抽象概念。”^⑤不过皮亚杰同时指出：“如果认为，以表象或思维的形式把活动内化，只是追溯这些活动的进程或利用符号或记号(意象或语言)来想象这些活动就行，而不必改变或丰富活动本身，那就太简单化了。实际上活动的内化就是概念化，也就是把活动的格局转变为名副其实的概念，哪怕是最低级的概念也好(事实上我们只能称这种概念为‘前概念’)。”^⑤

可以看出，皮亚杰一方面论证了作为个体早期认识的形象与具体性质，另一方面皮亚杰也向我们展示了概念是如何从形象与具体性质中产生出来的。

① 刘文英：《漫长的历史源头——原始思维与原始文化新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21—133页。

② [瑞士]皮亚杰、英海尔德：《儿童心理学》，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75页。

③ [瑞士]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22页。

④ 同上，第29页。

⑤ 同上，第28、29页。

三、因主客之间相通性而形成的互渗特征

作为原始思维的又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在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之间存在的混沌的互渗关系。这样一种思维特征的知识与宗教活动背景是与农耕文明相关的对自然及其法则的急切了解以及必然而导致的通神方式。

互渗这一提法或概念最早见之于列维-布留尔的《原始思维》。列维-布留尔说：“有一个因素是在这些关系中永远存在的。这些关系全都以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包含着那个作为集体表象之一部分的人和物之间的‘互渗’。所以，由于没有更好的术语，我把这个为‘原始’思维所特有的支配这些表象的关联和前关联的原则叫做‘互渗律’。”^①那么，“互渗”究竟是什么呢？或者说，“互渗”思维究竟是怎样的呢？尽管列维-布留尔意识到“要立即用抽象的术语作出这个定律的公式是困难的”，但他仍说：“我们还是可以尝试着去作出大致不差的定义。”这就是“在原始人的思维的集体表象中，客体、存在物、现象能够以我们不可思议的方式同时是它们自身，又是其他什么东西。它们也以差不多同样不可思议的方式发出和接受那些在它们之外被感觉的、继续留在它们里面的神秘的力量、能力、性质、作用。”^②

一个非常明显也为我们所熟悉的例证就是人与动物的关系。众所周知，“不发达民族中间的一个十分普遍的信仰，即相信人和动物之间，或者更确切地说，一定集团的人们和某些特定的动物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亲族关系。”^③这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图腾，是原始人作为族群与动物的互渗关系。除此之外，作为任何一个个体，同样可以具有或建立这样一种互渗关系，例如原始人相信，他“既可以是人，同时又可以长着鲜红羽毛的鸟”。列维-布留尔认为：“对于受‘互渗律’支配的思维来说，在这一点上是没有任何困难的。”^④于是，“一个社会集体

① [法]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69页。

② 同上，第70页。

③ 同上，第87页。

④ 同上，第70页。

或者单独的个人就这样认为自己与某种图腾动物有联系或者有亲族关系，它或他在自己与这个动物的实际关系中使这种互渗客观化。”^①不仅人与动物的关系是如此，原始思维还可以“想象在个别的熊和一般的熊之间，在个别的野牛和一般的野牛之间，在个别的鱼和一般的鱼之间有神秘的互渗”。^②互渗还可以扩大，甚至“在每个图腾集团和固定给该集团的一定空间之间，亦即在这个图腾集团与一定的方位之间，就存在着神秘的互渗。东南西北的方位又通过神秘的互渗而与一定的颜色、风、神话活动联系着；而后者又与河流或神圣的森林联系着，如此等等以至于无穷”。^③

十分有趣的是，皮亚杰对儿童思维的研究也支持了列维-布留尔的这种互渗理论。在他的《儿童的世界概念》一书中对此有较深入的研究。皮亚杰注意到，在儿童的思想中，有生命的事物与无生命的事物是时常混淆的，在儿童阶段很难对这两种不同的事物加以区别，而这实际上就是互渗现象。皮亚杰认为，儿童的互渗虽与原始人有所不同，但有一点是相似的，这种相似之处即在于“当互渗的感觉从自我与外部世界的区别中出现之时，也就是自我在设想存在着一种巫术的力量，并开始赋予无生命事物以意识和生命”。^④皮亚杰在他的另一本著作《儿童的语言与思维》中也指出：“当儿童把这样两个性质不同的句子混合在一起时，他并不明白，他所做的事是人为的；他以为这两个联结的命题客观上是互相关联的；他认为一个命题意味着另一个命题。儿童把这个谚语投射到对应的句子上，这个对应的句子实际上又反作用于这个谚语，而当我们让这个儿童讲一个故事说明这个谚语时，这个故事也证明了这种互相渗透的情况。”^⑤皮亚杰进一步指出：“从混沌状态进行推理就是在这两个命题之间创造一个非常客观的关系。这种推理的主观性说明了儿童在使用一般的格式。如果这种格式是一

① [法]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89页。

② 同上，第89页。

③ 同上，第92页。

④ [瑞士]皮亚杰：《儿童的世界概念》。转见朱狄：《原始文化研究》，三联书店，1988年，第161页。

⑤ [瑞士]皮亚杰：《儿童的语言与思维》，文化教育出版社，1980年，第162页。

般的,这是因为这些格式是附加在命题上的而不是通过分析从这些命题演化出来的。混沌状态是一种‘主观的综合’,而客观的综合是要以分析为先决条件的。”^①总之,皮亚杰强调,只要自我未能和事物相分离,心理概念和物质概念就仍然是不能分离的。^②

具体地,皮亚杰区分了儿童思维中的四种互渗类型:1. 行为和事物之间的互渗;2. 思想和事物之间的互渗;3. 不同事物之间的互渗;4. 目的的互渗。而所有这些互渗现象归根结底来说都是巫术的表现。^③就发展而言,皮亚杰又将与互渗相关的儿童思维划分为三个阶段。其中在第一阶段中,自我和物是完全混淆的,在某一个人和某件事物之间的互渗中,他希望能对现实行使一种巫术力量;在第二阶段中,自我从物中区别出来,但主体在某些方面仍然依附于物。主体现在只是部分地含有物的性质,并相信可以对一定距离外的事物施加影响。^④

而无论是人类学的研究,还是心理学的研究,都表明了早期思维中互渗现象的普遍性。

四、因现象之间相似性而形成的比类特征

当原始人对现象的观察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们就会注意到某些现象之间所存在的相似性,以及受此启发或影响进一步去思考现象之间的关系或者内在联系。这样一种心智上的进步会通过思维方式体现出来,其主要就是联想以及类比。^⑤

早在18世纪,维柯就对人类思维及语言的比类特点做了描述。维柯注意到最初的语言普遍具有比喻、隐喻或联想特征。维柯在他的《新科学》一书中对此有十分生动和详尽的论述。维柯将比喻、隐喻或联想的特征或方法称之为是“诗性”的,并将原始人的智慧称作“诗性的智慧”,说“诗性的智慧,这种异教世界的最初的智慧,一开始就要用

① [瑞士]皮亚杰:《儿童的语言与思维》,文化教育出版社,1980年,第163页。

② 转见朱狄:《原始文化研究》,三联书店,1988年,第159页。

③ 同上,第162页。

④ 同上,第159页。

⑤ 其实按照列维-布留尔的说法,比类也应当是属于互渗思维。

的玄学就不是现在学者们所用的那种理性的抽象的玄学，而是一种感觉到的想象出的玄学，像这些原始人所用的。这些原始人没有推理的能力，却浑身是强旺的感觉力和生动的想象力”。^① 这种思维的一个生动体现即是几乎在一切语种里当涉及无生命的事物的表达时都会借用人体各部分的形象。维柯举例说：“值得注意的是在一切语种里大部分涉及无生命的事物的表达方式都是用人体及其各部分以及用人的感觉和情欲的隐喻来形成的。例如用‘首’（头）来表达顶或开始，用‘额’或‘肩’来表达一座山的部位，针和土豆都可以有‘眼’，杯或壶可以有‘嘴’，耙、锯或梳都可以有‘齿’，任何空隙或洞都可以做‘口’，麦穗的‘须’，鞋的‘舌’，河的‘咽喉’，地的‘颈’，海的‘手臂’，钟的‘指针’叫做‘手’，‘心’代表中央，船帆的‘腹部’，‘脚’代表终点或底，果实的‘肉’，岩石或矿的‘脉’，……”等等。^② 维柯说：“根据来自上述玄学的这种逻辑，最初的诗人们给事物命名，就必须用最具体的感性意象，这种感性意象就是替换（synecdoche，局部代全体或全体代部分）和转喻（metonymy）的来源。”^③

人类学家博厄斯对原始人的联想思维在理论上给予了十分细致的研究。博厄斯注意到：“对原始生活的研究为我们展示了属于不同类型的大量联想。”^④博厄斯说：“原始文化的显著特征是截然不同类型的现象之间产生的数量众多的联想，如自然现象与个人情况，社会群体与宗教观念，装饰艺术与象征意味。”^⑤博厄斯也将这样一种联想称之为“异类性质的联想”。并且，博厄斯指出，“仔细的研究表明，每一自发行为都有根据它有规律地出现时人的精神状况来建立自己联想的倾向，而且，很多自发行为被保留至今。……在原始文化中，对外部世界的印象是与主观印象紧密相关的，前者有规律地引发后者，但后者主要决定于个人所处的社会环境。”^⑥在这段话中，有两点很重要。

① [意]维柯：《新科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第161页。

② 同上，第181页。

③ 同上，第182页。

④ [美]弗兰兹·博厄斯：《原始人的心智》，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第124页。

⑤ 同上，第129页。

⑥ 同上，第130页。

第一,博厄斯指出了原始思维中的联想的一个特点,就是“对外部世界的印象是与主观印象紧密相关的”,这实际也就是列维·布留尔所说的互渗问题;第二,博厄斯说,原始联想的“很多自发行为被保留至今”,这表明作为一种思维,特别是人类普遍的思维,其对后世会产生持久的深刻影响。

弗雷泽也曾从比类思维的角度对此作过考察。弗雷泽注意到,在原始社会,基于“同类相生”也即相似律的巫术例证可以说是举不胜举。例如英属哥伦比亚印第安人的生活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们河里与海里的鱼产资源。如果鱼群在应来的季节里不来,他们就得挨饿。这时他们就请一位男巫做成一个游鱼的模型,放在鱼群通常会来的水域中。在举行这种仪式时还要念诵祈求鱼群游来的祷告。他们相信这样做,鱼群就会立即游来。在东印度群岛,当一个渔民要出海捕鱼时,他就找出一株其果实被鸟啄食得很厉害的树,砍其一段粗大的树枝,并将它做成他渔船上的主桅杆。他相信正如这株树能用其果实来吸引鸟一样,它的树枝也能吸引许多鱼前来。同样,生活在中西里伯斯群岛上的托拉查人相信,同种类的东西通过它们内在的灵气或其周围的有生命力的媒介而互相吸引,于是,他们就把鹿和野猪的颞骨悬挂在家里,以便赋予这些骨头以生命的灵气,而驱使它的同类前来。而在尼亚斯岛上,当一只野猪落入陷阱以后,当地人就用九片树叶擦其背。这是由于当地人相信,正如九片叶子从树上掉下来一样,也会有九头野猪掉入陷阱。^①以上是法术,又如禁忌。爱斯基摩人禁止孩子玩“翻花篮”的游戏,因为爱斯基摩人相信,如果孩子在玩“翻花篮”时手指被绳子缠住了,孩子长大后捕鲸时,他的手指也会被系鱼叉的绳子缠住。在喀尔巴阡山区的胡祖尔人那里,当猎人吃饭时,他的妻子是不可以纺纱的,因为胡祖尔人认为这样猎物也将会像纺锤一样转来转去,以致猎人难以捕获它。基于类似的原因,在印度的比拉斯普尔,当村长召集会议时,任何出席者不得转动纺锤,他们认为如果这样做,那么他们的讨论就将如纺锤一样转圈,永远得不到结果。在苏门答腊各地,孕妇不得站在门口或房前的台阶上,因为当地人相信这

^① [英]詹·乔·弗雷泽:《金枝》(上),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29页。

样做会导致孕妇遭受难产之苦。在马达加斯加，士兵们被禁止吃刺猬肉。因为他们认为刺猬一遇惊吓就缩成一团，因此担心吃了刺猬肉的人也会形成胆小畏缩的性格。同理，这些战士也要避免吃死于争斗的公鸡或任何其他被刺死的东西，在他外出作战时，家里也绝不允许杀死任何雄性动物，因为他担心自己会遭遇相同的厄运。^① 这样的巫术在古代中国也是多如牛毛，层出不穷。如求子。新人结婚吃饺子时，饺子只须煮三四分熟，目的就是讨人说一个“生”字。又如求雨。按中国传统观念，女人属阴，男人属阳，而（雨）水亦属阴，故求雨时男子只能“退避三舍”、暂受委屈。^②

皮亚杰则使用“类比”这一概念来说明儿童时期的相似现象。皮亚杰认为：可以“通过由类比所引起的推理过程”，“在这类的推理中，受试者从两个不同的对象中分别取出的两个因素的类似去论证这两种比较的对象的完全类似。”^③这再一次表明儿童期的思维是从现象出发的，只有现象有相似之处，就可以从局部甚至个别推演至整体。据此，皮亚杰进一步指出：“不惜代价提出证明的这种欲望乃是儿童的言语智力所具有的一个普遍法则，而这个法则本身是从儿童推理的混沌性质中派生出来的。从混沌的观点看来，一切事物都是关联的，一切事物都是互相联系的，儿童是通过一个由想象、细节的类比和可能的条件所构成的一般格式的网状组织去感知一切事物的。这个事实十分自然地会使那些有混沌心理的人认为，就不应该有偶然的或人为的观念存在；结果，他就必然要为每一件事情找出一个理由。”^④也就是说，在早期思维（包括个体思维和人类思维）中，联系是普遍的或先在的，思维正是从这种先在的和普遍的网状格式出发去连接也即联想与类比那种现象或事物。

维柯、弗雷泽、博厄斯、皮亚杰等人是从不同的研究领域出发，并

① [英]詹·乔·弗雷泽：《金枝》（上），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32—35页。

② 可参见张紫晨：《中国巫术》，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胡新生：《中国古代巫术》，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

③ [瑞士]皮亚杰：《儿童的语言与思维》，文化教育出版社，1980年，第164页。

④ 同上，第172、173页。列维-布留尔也从原始思维的角度指出：“对原始人来说是没有任何偶然的东西。”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66页。

使用了不同的概念或语词,但他们所关注的现象或问题却是相同的。这里还值得补充的是,列维-斯特劳斯在研究中虽然主要是考察“类”的概念,但他也注意到,在原始思维中经常会出现“比类”的现象,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就是泡尼印第安人将植物、颜色、方位、时间放在一起所作的比类性理解,如白杨树-白色-西南-季、美洲枫树-红色-东南-夏季、榆树-黑色-东北-冬季、柳树-黄色-西北-冬季。^①而相同的情况我们也可以在古代中国人的思维中广泛看到。

五、因事物之间相关性而形成的整体特征

早期思维并不仅仅注意到现象之间的相似性,而且也注意到了事物之间的相关性。

早期思维中这样一种相关性或即整体性的问题在皮亚杰有关发生认识论的研究中被加以注意。根据皮亚杰的研究,约七岁到八岁的儿童在具体运演中已经具备了某种“在控制论中有时称之为‘完整的’调节的那种东西”。^②具体来说这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协调,“这种协调是朝向系统整体的,因而是倾向于通过把这些分散的顺序或局部的联合等等联结起来以产生出系统的闭合”。另一个方面“是这种协调过程中所特有的自我调节。它使系统的联结就正反两方面而言达到平衡”。^③这就是说,早期或原始思维中对相关性或整体性问题的把握是可能的。

当然,事实上,这样一种思维的存在也可以得到人类学、考古学以及科学技术史等方面研究的证明。例如按照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的理论,原始人的思维是有一种整体格局的。列维-斯特劳斯转述了一位土著思想家所表达的见解:“一切神圣事物都应有其位置”。^④列维-斯特劳斯分析道:“人们甚至可以这样说,使得它们成为神圣的东西就是各有其位,因为如果废除其位,哪怕只是在思想中,宇宙的整

① [法]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159页。

② [瑞士]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39页。

③ 同上,第42页。

④ [法]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14页。